

## · 专 论 ·

## 八十年以来秦汉军制研究述评

孙闻博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北京 100872)

秦汉军制主要涉及军事组织结构、兵员征集、军队构成、军事征发、军务运作。相对而言,以往对整个中国军事史研究的学术回顾,要更多一些。如刘苏《1988—1989年中国古代军事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9期),童超《80年代以来的中国古代军事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6期),江英《近两年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新进展(一)》、《近两年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新进展(二)》(《军事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1996年第1期),以及黄朴民、谢宝耿《中国军事史研究:史学研究新的生长点——黄朴民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3年第12期),黄朴民《中国军事史研究的困境与转机》(《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建国以来的中国古代军事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等。而具体到秦汉时期军事制度的学术史回顾,则较为不足,这里尝试对80年来秦汉军制研究进行初步回顾及评述。

## 一、建国以前的秦汉军制研究

政书立“兵”目虽始于唐,但对“兵志”的撰述,两宋以后更为重视。这与赵宋国家“积弱”,军事不振,士大夫思谋改革关系密切。南宋出现的不少著作,多有通论历代兵制,而兼及秦汉者,如陈傅良《历代兵制》卷一至卷三,章如愚《山堂考索》卷三八至四〇、卷四四至五〇《兵门》,卷四一至四三《兵制门》,王应麟《玉海》卷一三六至一五一,以及《文献通考》卷一四九至一五〇、卷一五五至一六一等。专论两汉军制的论著这时也首次出现,即为人熟知的《补汉兵志》。全书篇幅

短小，只一卷。取材据两汉书，“附以考证论断”。作为钱文子门人的陈元粹，在序中全言两宋军制积弊，则如四库馆臣所总结，该书同样“盖为宋事立议，非为《汉书》补亡也”。不过，钱氏所做工作，仍然为后来研究开启了先声。

真正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秦汉军制研究，大体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这与当时民族危机加剧，国内战事不休同样关系颇深。雷海宗是这一领域研究的先驱，他先后发表《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社会科学》第1卷第1、4期，1935、1936年）等长文，以社会史的眼光看军事史，通过研究“兵的精神”，即兵的成分、纪律、风气、心理，来考察军制变化，是“把军事和社会文化打通来研究的经典之作”（邵鸿《张家山汉简〈盖庐〉研究》“后记”，文物出版社，2007年）。雷氏认为，春秋时上等社会全体当兵。至战国除少数文人外，全体文人当兵，近乎征兵制。汉代改行“更赋”制，上等社会不服兵役，终于实行募兵制，将卫国责任移到职业兵肩上。由军民不分，经军民分立，到军民对立，专靠羌胡兵，以致国势日衰，社会病弱，中原终于成了汉代那些属国的属国。孙毓棠在同时期也发表《西汉的兵制》（《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5卷第1期，1940年）、《东汉兵制的演变》（《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3卷第1期，1936年）等文，对两汉军制发展的脉络进行了全面考察与勾勒，同属相关研究的奠基之作。此外，武宗灿《西汉兵制考》（《国专月刊》第3卷第3期，1936年）、谷霁光《汉代兵制考略》（《益世报·史学》1936年10月12日）也是较早通论汉代军制的文章。这些研究主要侧重军队建置。至40年代，劳榘发表著名长文《汉代兵制及汉简中的兵制》（《史语所集刊》第十本，1942年），以传世文献结合30年代所出居延汉简，对兵种变化、武官设置、兵员征集、地方与边郡兵，及国防政策等问题有所探讨。徐德麟的《西汉兵制及其国防》（《文化先锋》第6卷第8期，1946年）、《东汉兵制及其国防》（《政治季刊》第5卷第1、2期，1947年），对两汉军制的演进也有梳理。杜畏之《战国时期军事之研究》（《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3卷第1期，1936年）、罗志渊《西周春秋战国兵役制度研究》（《新政治》第2卷第5、6期，1939年）所做的稍早时段讨论，对把握秦汉相关问题的渊源也多有帮助。特别杜文以西方军事史著作进行中西对比，视野较为开阔。

专题性研究有以下论著。刘公任《汉代之征兵制度》（《广西大学周刊》第2卷第8期，1940年）对汉代的征兵有专门探讨。军队建置方面，贺昌群《汉初之南北军》（《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5卷第1期，1937年）则是较早专门分析中央军者。涉及边郡军事问题的，则有家铨《东汉王符的救边论》（《行健月刊》第4卷第3期，1934年）、容肇祖《东汉时关于边事之舆论》（《大公报·史地周刊》第84卷，1936年），以及立意关系密切的史念海《秦汉时代关西人民的尚武精神》（《东方杂志》第41卷第22期，1945年）。这些讨论无不透露着深切的现实关怀。涉及西域者，有于鹤年《汉代西域行政制度沿革述略》（《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2卷第5期，1934

年)、韩儒林《西汉西域屯田与车师伊吾的争夺》及《补记》(《文史杂志》1942年第2、4期)。对于武器装备的专论,则有陶元甘《西汉兵器之造作守藏禁制与迷信》(《责善半月刊》第1卷第10期,1940年)。

## 二、1950年代以来秦汉军制综论

195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及日本学界的相关探讨更显广泛深入。较为系统的阶段总结与论述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的相关词条。而时代较早、探讨较为全面的论著,当推滨口重国《秦汉隋唐史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该书的“第一部”、“第二部”,对秦汉军制的诸多基本问题,均有较好讨论,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日本学界后续研究,也多在滨口氏所做基础上展开(重近启树《围绕秦汉兵制的若干问题》,佐竹靖彦主编《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中华书局,2008年;小林文治《日本秦简研究现状·算赋、徭役、兵役》,《简帛》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此外,引人注目的还包括几种秦汉军制论著的出现。稍早有李玉福《秦汉制度史论》下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对秦汉士兵组成体制、建军体制、法律及监军制度作了论述;在期门、羽林及南北军问题上,有较新看法。熊德基《秦汉军事制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分十一章,从“兵士”、“军队”、“装备”、“军马”、“给养”、“营垒”、“军费”及“军法”诸方面进行史料梳理与分析。作者尝试将“军队”一目分成常备军、野战军与边防军。严格上讲,三者并非同一范畴,但注意对军事组织作日常系统与行军系统的区分,则有可取处。黄今言《秦汉军制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稍晚问世,影响更大。该书一大特色即注意参考现代军事学中军事制度分类来设计章节,体系较好。作者于1980年代参与《中国军制史》项目,积累了充足的秦汉军事史资料,又在之前开展过秦汉赋役制度研究(《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为相关写作提供了较好条件。该书资料较为丰富,论证较为扎实。作者后来还参与《中国军事通史》的编写,所作《东汉军事史》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也可供参考。这一通史系列每卷的前半部分是军事史,后半部分为军事制度,多依史料叙述,考证辨析较少。其中的四、五两卷(霍印章《秦代军事史》、陈梧桐等《西汉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涉及秦与西汉,可以关注。此外,欧美学者的相关研究也值得注意。鲁惟一(Michael Loewe)的 *The Government of the Qin and Han Empires 221BCE - 220C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2006)中,专设“军队”一节进行了全景式论说。狄宇宙(Nicola Di Cosmo)主编 *Military Culture in Imperial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则汇集了西方研究中国军事史重要学者的专题讨论 14 篇。其中, 前 4 篇均与秦汉军事问题相关。

交通的发展历来与军事活动关系密切。王子今所著《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年;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增订) 不但全面推进秦汉史、中国古代交通史的相关研究, 而且书中很多章节, 如第 1 章“秦汉交通道路建设”、第 3 章“秦汉车辆制作”、第 4 章“陆路运输动力的开发”、第 10 章“秦汉仓制与主要粮路”、第 12 章“秦汉运输业”、第 13 章“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第 14 章“秦汉通信形式”等, 对涉及军事制度的有关问题也多有分析, 值得后来研究者重视。

### 三、1950 年代以来秦汉军制的专题研究

具体到专题研究, 首先来看兵员征集与军队构成。有延续之前传统, 对相关制度做长时段勾勒的, 如臧知非《汉代兵役制度演变论略》(《山东大学学报》1991 年第 1 期) 指出汉代兵役制度由汉初的征兵制演变为征兵、募兵、少数民族兵、刑徒兵诸种方式并存, 最后征兵制名存实亡。整体判断上与前人相差不大, 但在个别环节上呈现新意, 如认为“东汉刑徒兵远较西汉为多, 戍卒几乎都由刑徒担任”。而对上述某种集兵方式进行探讨的专论则更为多见。关注谪戍与刑徒兵问题者, 主要有高敏《秦汉史杂考十二题》“‘谪戍’制非始于秦始皇而始于商鞅说”条(《秦汉史论集》, 中州书画社, 1982 年)、臧知非《“谪戍制”考析》(《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 年第 3 期; 商榷意见参屈建军《〈谪戍制考析〉一文质疑》,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 年第 2 期)、胡大贵《关于秦代谪戍制的几个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 年第 1 期)、蒋非非《秦代谪戍、赘婿、间左新考》(《北京大学学报》1995 年第 5 期), 以及李玉福《论秦汉时代的谪发兵制和刑徒兵制》(《政法论丛》2002 年第 6 期)、陈晓鸣和饶国宾《汉代刑徒兵论略》(《抚州师专学报》1992 年第 1 期) 等。睡虎地秦简公布后, 《编年记》中的官吏从军也引起学者注意, 熊克作有《“吏谁从军”解——读秦简〈编年记〉札记》(《中国史研究》1979 年第 3 期), 略有解读。关于外族兵, 也有学者对史料进行较认真梳理而有所论述的。代表性研究如陈连庆《西汉与新莽时期的少数民族士兵》、《东汉时期的少数民族士兵》(《中国古代史研究——陈连庆教授学术论文集》,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1 年), 王子今《两汉军队中的“胡骑”》(《中国史研究》2007 年第 3 期)、《汉王朝军制中的“越骑”部队》(《史学月刊》2010 年第 2 期; 修订稿均收入所著《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以及常璩有关“突骑”方面的论述(《从突骑到甲骑具装——魏晋南北朝骑兵之演进》, 《中国中古史研究》第九期, 兰台出版社, 2009 年;

《汉画像石中“胡汉交战”图与两汉的突骑——两汉骑兵变革与中国古代骑兵分类》，《国学研究》第二十八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讨论募兵的有黄今言《汉代型募兵试说》（《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张鹤泉《东汉募兵论略》（《史学集刊》1988年第4期）。关注东汉屯驻营兵的，有张鹤泉《东汉时期的屯驻营兵》（《史学集刊》2006年第3期）等。东汉时引人注目的还有家兵的出现。学者亦有关关注，并注意探讨它与世兵制的联系，如臧知非《汉代家兵初探》（《史林》1988年第3期）、黄今言《东汉末季之家兵与世兵制的初步形成》（《南昌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等。

其次，中央军、地方军、边防军的建置与兵力构成，也一直是研究热点，成果十分丰富。先说中央军。这一时期首先需提到劳榦所作《论汉代的卫尉与中尉兼论南北军制度》（《史语所集刊》第29本下册，1958年），该文在孙毓棠、贺昌群等前人研究基础上重新梳理史料，提出不少新的看法，如“凡是卫士都只替皇帝服役”，“实际上中尉是承秦时旧制，专来管理秦本国军队的”等。但如下面的判断：“秦时……假如郎及大夫各有一令，其上必有一卿来做主持的事。这一个卿可能就是卫尉，郎中令本为卫尉下的一个令”，则尚需搜集论据，展开分析。讨论中央军，核心部分在与皇帝密切的宿卫系统上。而要明确宿卫系统，则要首先弄清当时的宫省制度。大陆与台湾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不约而同地关注到这一问题，并有很大推进。前者如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宫省制度”、“宫卫制度”、“南军北军”等部分的论述，依中央官吏府寺所在及办公区域，将相关官吏分为宫外的外官、宫内省外的官官、省中的省官。即将宫内分为宫内省外与省中两部分。廖伯源《西汉皇宫宿卫警备杂考》（《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年）直接从宿卫制度入手，将宫内分为三重体系：卫尉主宫内殿外，光禄勋主殿内省外，少府（主要指宦者）主黄门之中的省中。相关的梳理、辨析，还有苏诚鉴《西汉南北军的由来及其演变》（《安徽师大学报》1980年第3期），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4年）相关部分，以及邹本涛《西汉南北军考辨》（《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1期）、曲柄睿《汉代宫省宿卫的四重体系研究》（《古代文明》2012年第3期）等。除空间角度外，学界对中央军在两汉魏晋时间脉络中的转变也颇为关注，如臧知非《试论汉代中尉、执金吾和北军的演变》（《益阳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黄今言《东汉中央直辖军的改革》（《安徽史学》1996年第2期）、张焯《汉代北军与曹魏中军》（《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汉代部分。对将军、期门羽林、司隶校尉等个别武职的专论，也大量问世。倘择要列举，涉及将军者，有廖伯源《试论西汉诸将军之制度及其政治地位》、《东汉将军制度之演变》（均收入所著《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张艳国《论汉武帝时代将军制度的缘起》（《学术月刊》1989年第3期）、《汉武帝时代将军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以

及佐藤直人《前汉后半期における前后左右将军について》（《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第25号，2001年）等。涉及期门羽林，有黄今言《汉代期门羽林考释》（《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涉及司隶校尉，有朱绍侯《浅议司隶校尉初设之谜》（《学术研究》1994年第1期）、《西汉司隶校尉职务及地位的变化》（《史学月刊》1994年第4期）及《浅议司隶校尉在东汉的特殊地位——司隶校尉研究之三》（《南都学坛》1997年第1期）。

对地方特别是内郡军事组织的讨论，除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及前举《汉魏制度丛考》、《秦汉官制史稿》等书列有条目进行论述外，值得注意的还有陈梦家《西汉都尉考》（《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该文据文献、碑刻、封泥等资料，较早对西汉都尉设置、治所、前后变化进行全面考察。日本则有市川任三《前汉边郡都尉考》（《立正大学教养部纪要》第2号，1968年）等。又，于豪亮《云梦秦简所见职官述略》（《文史》第八辑，中华书局，1980年）对睡虎地秦简中涉及的邦司空、县司空、县司马、发弩等军事职官的讨论，也多有新意。施丁《秦汉郡守兼掌军事略说》（《文史》第十三辑，中华书局，1982年）、邹水杰《秦汉县丞尉设置考》（《南都学坛》2006年第2期）对郡县长吏中涉及武职者的若干问题也做了扎实工作。此外，地方兵制向魏晋的转变同样为学者所重视。张焯《从东汉督军制到魏晋都督制》（《史学月刊》1994年第6期）、高敏《东汉魏晋时期州郡兵制度的演变》（《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作了富有新意的探讨。

至于边防兵的研究，则集中得多。日本学者藤枝晃1954年发表《汉简职官表》（《东方学报》第25册，1954年，收入《简牍研究译丛》第一辑，孙言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对居延、敦煌、楼兰简所见边郡官府机构、职官地位及职能有全面梳理，工作扎实，至今仍多被参考。米田贤次郎《汉代边境防备のについて》（《史学杂志》第61卷第12号，1952年）、《汉代の边境组织——队の配置について》（《东洋史研究》第12卷第3号，1953年）、《秦汉帝国的军事组织》（《古代史讲座》第5号，学生社，1962年，收入《简牍研究译丛》第二辑，余太山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等，主要据居延汉简，讨论边地军事防御及屯田等系列问题。陈梦家1960年代完成的《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汉武边塞考略》（均收入《汉简缀述》，第205—219页）等文，利用西北汉简并结合文献，对西汉武帝以来的边防设置与边地军事组织建制进行了全面研究，构建起一个大体的系统。虽限于条件，一些方面有待完善，但推进良多，对后来的影响也较大。这一时期较重要的长文还有张春树《汉代河西四郡的建置年代与开拓过程的推测：兼论汉初西向扩张的原始与发展》（《史语所集刊》第37本第2分，1967年）在讨论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边境开拓中行政制度演化的同时，对汉代开拓河西地区的整个过程有综合考述。而伴随上述过程的屯田问题，学界研究成果也

十分可觀。除前舉陳夢家文有較好涉及外，管東貴《漢代的屯田與開邊》（《史語所集刊》第45本第1分，1974年）、《漢代屯田的組織與功能》（《史語所集刊》第48本第4分，1977年），對這一問題也有詳細闡述。兩文將屯田組織的發展置於當時大的歷史背景之下，溯源析流，考證扎實，對屯田的人員構成、征集方式，也做了前人未及的細緻工作。在大陸學界，劉光華所著《漢代西北屯田研究》（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年）是這方面的集中成果。而對邊防軍給予整體性關注，則多見於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近20年。陳曉鳴的系列探討多集中於這一方面，如《漢朝邊防軍的規模及其養兵費用之探討》（《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1期）、《秦漢邊防兵的特點及其作用》（《江西師範大學學報》1992年第3期）、《兩漢邊防兵制若干問題之比較——以西、北地區為中心》（《史學月刊》2001年第2期）、《兩漢北部邊防若干問題之比較》（《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3期）、《籌邊失當與東漢衰亡》（《江西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4期）、《兩漢邊防集兵方式述論》（《湖南文理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而宋超《漢匈戰爭與北邊郡守尉》（《南都學壇》2005年第3期）、臧知非《“偃武修文”與東漢邊防》（《人文雜誌》2008年第4期）也拓展了相關領域的研究。

隨著帝國向西域擴展，北邊族群內附，兩漢王朝在西邊、北邊先後設置一系列領護武職。這些職務及機構的設置，也是邊地軍制研究的重要內容。自勞榦《漢代的西域都護與戊己校尉》（《史語所集刊》第28本上冊，1957年）以下，多年來對西域都護、戊己校尉的研究與爭論一直持續。關於前者，略舉近年成果，有李大龍《西漢西域都護略論》（《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2期）、洪濤《漢西域都護府的建立及其歷史地位》（《西域研究》1999年第3期）、劉國防《漢西域都護的始置及其年代》（《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李炳泉《關於漢代西域都護的兩個問題》（《民族研究》2003年第6期）。至於後者，由於機構、人員及治所前後有所變動，尤為學人關注。如林劍鳴《西漢戊己校尉考》（《歷史研究》1990年第2期）、余太山《兩漢西域戊己校尉考》（《史林》1994年第1期）、李炳泉《兩漢戊己校尉建制考》（《史學月刊》2002年第6期）、孟憲實《西漢戊己校尉新論》（《廣東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王素《高昌戊己校尉的設置——高昌戊己校尉系列研究之一》（《新疆師範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王素《高昌戊己校尉的組織——高昌戊己校尉系列研究之二》（《中國歷史文物》2005年第4期）、劉國防《西漢比胥鞬屯田與戊己校尉的設置》（《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等等。

此外，有關護羌校尉、護烏桓校尉、使匈奴中郎將及度遼將軍的研究成果，亦較豐富。這裡擇要列舉國內研究，涉及護羌校尉者有邊章《兩漢的護羌校尉》（《西北師大學報》1991年第1期）、高榮《漢代護羌校尉述論》（《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3期）、李大龍《東漢王朝護羌校尉考述》（《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

谢绍鹑《两汉护羌校尉略考》(《人文杂志》2009年第1期)、刘国防《西汉护羌校尉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3期)。研究护乌桓校尉者主要有林幹《两汉时期“护乌桓校尉”略考》(《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李俊方和魏舶《汉晋护乌桓校尉职官性质演变探析》(《北方文物》2009年第4期)。研究使匈奴中郎将有何天明《东汉使匈奴中郎将探讨》(《北方文物》1990年第4期)、李大龙《东汉王朝使匈奴中郎将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4期)、韩香《试论“使匈奴中郎将”的来源及演变》(《新疆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研究度辽将军有何天明《两汉北方重要建制“度辽将军”探讨》(《北方文物》1988年第3期)、李大龙《东汉度辽将军述论》(《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又,廖伯源《从汉代郎将职掌之发展论官制演变》(《史语所集刊》第65本第4分,1994年)从中央郎将职掌的历史变化来看“使匈奴中郎将”的出现及特征,并对任职者有仔细梳理。文末将相关史料制成若干表格,便于后人使用。

此外,还需提到近年王子今所著《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该书充分重视秦汉边疆和民族问题处理作为“国家主要行政主题”的意义;具体讨论中,对“秦汉帝国的政治机能和秦汉社会的文化胸怀”有较好地揭示。全书在对秦汉帝国各边疆地域与少数民族群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将关注进一步推进到“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层面,提出一系列富有启发的新见,对秦汉边疆史与秦汉民族史的研究有相当推进。

#### 四、存在的问题及不足

至于前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大体有如下几点。秦汉军制虽然很早即为学人所重视,积累有大量成果。但迄今为止,对此问题的研究却缺少基本的学术史梳理与回顾。即便之前提到的几种专著,也很少对前人研究有所参考与总结。重复工作较多,进而对秦汉史、古代军事史研究的影响和推动较为有限。这也是笔者尝试开展相关梳理工作的原因所在。

马克思、恩格斯曾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大量军事学词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396页),对战争的历史、军队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有较全面阐释,且这些讨论多有上溯古代者,值得进一步重视与参考。又,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约翰·基根《战争史》(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以及美国学者杰弗里·帕克等所著《剑桥插图战争史》(傅景川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R·E·杜派、T·N·杜派《哈珀—柯林斯世界军事历史全书》(传海等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前苏联组织编写的《苏联军事百科全



書》(中譯本,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戰士出版社, 1982 年) 等, 也具有相當的參考意義。目前研究雖然對西方軍事學、戰爭學研究著作有所使用, 但只是大體借用現代軍事理論來對古代軍事制度進行基本的分類梳理, 缺乏制度演變的整體性觀察。

以往研究, 雖使用了包括出土文獻在內的考古文物資料, 但多以簡單引用已有研究成果, 或离散提取相關簡文作輔助說明者為多。較少對簡牘、封泥、印章、題銘、石刻資料進行充分搜集與綜合分析。

對傳世史料的爬梳已較為細緻, 宏觀論說也較多, 但仍有一些基本問題尚未厘清。材料的使用與組織上, 不夠注意年代、地理方面的時空性把握。

相對軍制個別問題的論述而言, 對軍制演變的探討, 似乎並不充分。至於各制度間的相互作用與影響, 更較少開展分析。雷海宗以下, 更多學者進行小專題下的細節梳理, 文獻辨析, 對於社會身份結構變化與軍事組織結構、軍隊構成的互動, 較少進行綜合思考與闡述。

## · 書訊 ·

### 《神文時代：讖緯、術數與中古政治研究》出版

孫英剛著《神文時代：讖緯、術數與中古政治研究》作為《中古中國知識·信仰·制度研究書系》第二輯的一種, 2014 年 2 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內容涵蓋了讖緯神學、星占術、歷律學、術數學、政治預言術等方面, 着力探討神學領域與古代政治間的相互關係。

全書在《緒論》以外, 分“天命與預言”、“祥瑞與災異”、“歷數與歷術”

作為上、中、下三篇。書中將主要關注點集中於中古時期即秦漢至隋唐時期的特殊神學與政治生活的內容與關係, 資料豐富, 文字流暢, 論證詳盡, 具有相當的學術價值。此前學術界有關成果不多, 該書的面世將有利於推動研究走向深入。

(張家珍)